

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及其学理化阐释

檀学文

摘要：已有关于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研究阐释的体系化、学理化程度不足，致使其理论价值发挥受限。同时，在贫困研究谱系中，贫困理论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反贫困理论发展面临困境。本文尝试从习近平反贫困论述中归纳提炼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将其定位为实践型反贫困理论，并对其科学性、创新贡献和重大意义进行论证。具体来说，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为“两个明确、六个坚持”，其核心是回答新时代为何以及如何消除农村绝对贫困问题。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包含鲜明的理论主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反贫困的基本问题，理论结构完整，具有开放发展的理论品质，因而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是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发展，可以推动全球减贫理论创新。提炼和传播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有利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发展，指导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战略转型。

关键词：习近平反贫困论述 习近平反贫困理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精准扶贫 脱贫攻坚

中图分类号：F061.3; F323.8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对如何从贫困走向富裕的探索，不仅催生了发展经济学，而且在这一学科内部孕育了贫困理论。蓬勃发展的贫困研究与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等新兴学科结合，形成丰富的贫困理论体系。然而，作为发展经济学经典主题的反贫困研究并未发展出成熟的反贫困理论。中国伟大的扶贫实践孕育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长

[资助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条件下相对贫困治理的实现路径研究”（编号：22&ZD059）；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DF2023YS26）。

[作者信息] 檀学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电子邮箱：tanxw@cass.org.cn。

期投身反贫困实践，不断思考其中的理论和政策问题，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就农村扶贫脱贫问题作出了大量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论述系统、全面、深刻，除涉及扶贫脱贫工作本身外，还涉及小康社会建设、共同富裕等方面。本文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的相关论述统称为习近平反贫困论述。习近平反贫困论述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符合国情民意，成功指导了打赢脱贫攻坚战，获得了国内外的广泛认同。近年来，学术界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进行了大量研究阐释，但其体系化、学理化程度仍显不足，标识性概念不突出，理论价值发挥受限。时代是思想之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洪流孕育了习近平反贫困论述；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摆脱贫困的伟大实践可以产生与之相匹配的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从理论来源来说，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只能也必须从习近平反贫困论述中提炼得到。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是习近平反贫困论述以及中国消除贫困的实践经验的结晶，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新时代的主体性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提炼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有助于提高作为知识和思想宝库的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归纳和阐释效果，提升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体系化、学理化水平，促进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发展及国际交流对话，并对新时期的中国反贫困战略转型发挥指导作用。

二、反贫困理论框架的构建

中国的反贫困理论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研究阐释、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研究阐释等领域。为了总结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有必要对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理论进行必要的理论辨析。这是因为，反贫困理论主要作为政治经济学话语出现在中文文献中，国外文献很少采用反贫困理论的表述，而且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理论容易产生混淆。因此，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反贫困理论框架，对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理论、实践型反贫困理论与学术型反贫困理论进行区分，以明确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定位。

（一）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研究阐释的述评

习近平总书记善于思考和总结，形成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在反贫困领域亦是如此。《摆脱贫困》一书最早出版于1992年，此后多次再版，常销不衰。《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从八个方面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发表的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随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研究阐释的开展，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归纳总结、研究阐释同步推进，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根据主题词，相关研究涉及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理论内涵（科学内涵）、科学性、精神实质、理论特质（理论品格）、生成逻辑、形成过程、价值意蕴、多重贡献等（龚

云和刘鑫鑫，2021；张建君，2021；全国政协办公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第一课题组，2026）。在这些文献中，习近平反贫困论述有时被称为扶贫（重要）论述、扶贫思想、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等（黄承伟，2018；刘永富，2018；王飞，2022）。截至目前，还鲜见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表述。

纵观近十年的公开文献，现有研究在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理论内涵、生成逻辑及形成过程、价值和贡献等方面的共识程度较高。例如，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理论内涵和主要内容包括明确目标、精准方略、党的领导、大扶贫格局、激发内生动力等方面（檀学文和李静，2017；刘永富，2018；邓金钱，2021；张建君，2021）；习近平反贫困论述在长期扶贫实践中形成，其形成过程遵循实践逻辑、理论逻辑以及历史逻辑，其形成方式蕴含科学的思维方式（王小琼和陈根来，2021）；习近平反贫困论述具有理论价值、实践价值以及世界意义。在理论成就方面，现有研究认为，习近平反贫困论述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的最新成果，为全球贫困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刘永富，2018；邓金钱，2021）。但已有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研究阐释在体系化、学理化建构方面有欠缺，对其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够清晰，与国际减贫理论对话的能力不足，理论创新滞后于实践创新。

（二）进一步研究阐释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理论任务

已有的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研究阐释未能充分体现其对打赢脱贫攻坚战所做的理论贡献，研究阐释还面临两大理论任务：一是提升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体系化、学理化表达水平。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提法虽具有系统性与完整性，但难以充分体现其内在理论特质。习近平反贫困思想的提法可以呈现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但是在表述上容易与更高位阶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各分领域的理论成果产生混淆。因此，进一步研究阐释习近平反贫困论述，既要提高凝练水平，又要探寻更适宜的表达方式。二是增强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理论对话能力。国外反贫困文献大多在贫困理论框架下进行微观层面的项目与政策效应分析，部分反贫困理论则偏向于宏观层面的研究。国内文献较多借鉴了“贫困—减贫”的国际研究范式，也有部分文献尝试构建反贫困理论，不过都难以摆脱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范式。总体来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话语体系与国际的“贫困—减贫”理论体系缺乏有效衔接。除了话语体系差异外，贫困理论与反贫困理论的分野也有待弥合。

（三）比较视角的反贫困理论框架

研究阐释习近平反贫困论述需要对其进行理论提炼，其预期目标是形成一套具有完整内在结构、内容更精练、理论特性更突出、解释力更充分的新表述。但在此之

前，还需要对反贫困理论的研究状况进行必要的审视。在笔者看来，在贫困研究的理论谱系中，反贫困理论研究面临两个方面的困境。一方面，贫困理论研究“有余”而反贫困理论研究“不足”。国际主流贫困研究文献几乎都采用贫困理论的表述及研究范式，而且贫困理论几乎等同于贫困成因分析（Bradshaw, 2006; Brady, 2019; Pineda, 2025）。贫困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对贫困现象及其变化进行解释，有时也叫减贫理论。这种研究范式虽能展示贫困成因和减贫来源，但难以提出解决全球或国家贫困问题的有效方案。另一方面，现有反贫困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尚不够清晰。虽然人类已有丰富的反贫困实践，但反贫困理论仍不多见。典型的反贫困理论有小额信贷理论、资产积累理论、可持续生计理论等，也包括广义上的发展型国家理论、减贫战略理论、国际援助理论等。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是反贫困理论的优秀代表，但与其他反贫困理论相比差别明显，容易引起认知上的混淆。

对如何区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与其他反贫困理论，辛向阳（2016）关于学术型理论与实践型理论的理论形态划分研究提供了思路。本文以贫困理论为原型，按照理论起点的不同，分别构建贫困理论框架和反贫困理论框架，进而对两者进行区分。减贫涉及一系列社会过程，因此形成了丰富的具体理论（森，2013；班纳吉和迪弗洛，2018）。这些具体理论按照减贫逻辑进行排列，可以形成完整的研究流程或理论路径，为便于表达可称为理论框架。贫困理论框架的起点是贫困界定，依次包含贫困测度、贫困识别、贫困成因分析、贫困人口行为规律分析、项目政策分析、（贫困人口对干预措施的）响应机制、减贫成效评价等环节。其中，作为起点的贫困界定属于规范研究，其他环节则属于实证研究。减贫成效评价结果可能导致对贫困的重新界定，从而重复上述理论路径（具体见图1a）。当前绝对贫困研究转向相对贫困研究就是一个典型情景。在贫困理论框架中，反贫困战略被视为给定的外生因素，并不是直接的研究对象。反贫困战略在短期基本是确定的，但长期是可变动的，从而可以将反贫困战略作为逻辑起点，构建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同样涵盖贫困理论框架的所有环节，但更侧重项目政策分析、减贫成效评价等环节（具体见图1b）。其中，国家或相关权威机构制定反贫困战略，会产生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决定贫困的界定；另一方面产生作为外部因素的贫困治理方案，形成作为干预变量的项目政策。这两个方面最终在响应机制环节汇合。在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中，减贫成效评价会影响反贫困战略实施，减贫目标达成会引起反贫困战略的调整转型。以上述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为参照，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具有独特性，可形成另一类反贫困理论框架，即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框架。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具有鲜明的国家治理属性，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是明确贫困治理任务。对中国来说，消除贫困作为国家使命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治理任务，而是从属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富裕等宏

观战略目标。确定国家治理任务后，可根据国情设定减贫目标，进而按减贫目标推进贫困界定、贫困识别等后续流程（具体见图1c）。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框架的构建者未必需要专门研究贫困人口的行为规律，但需要把握该规律，提出系统性治理思路，推动贫困治理思路转化为治理方案，并推动方案有效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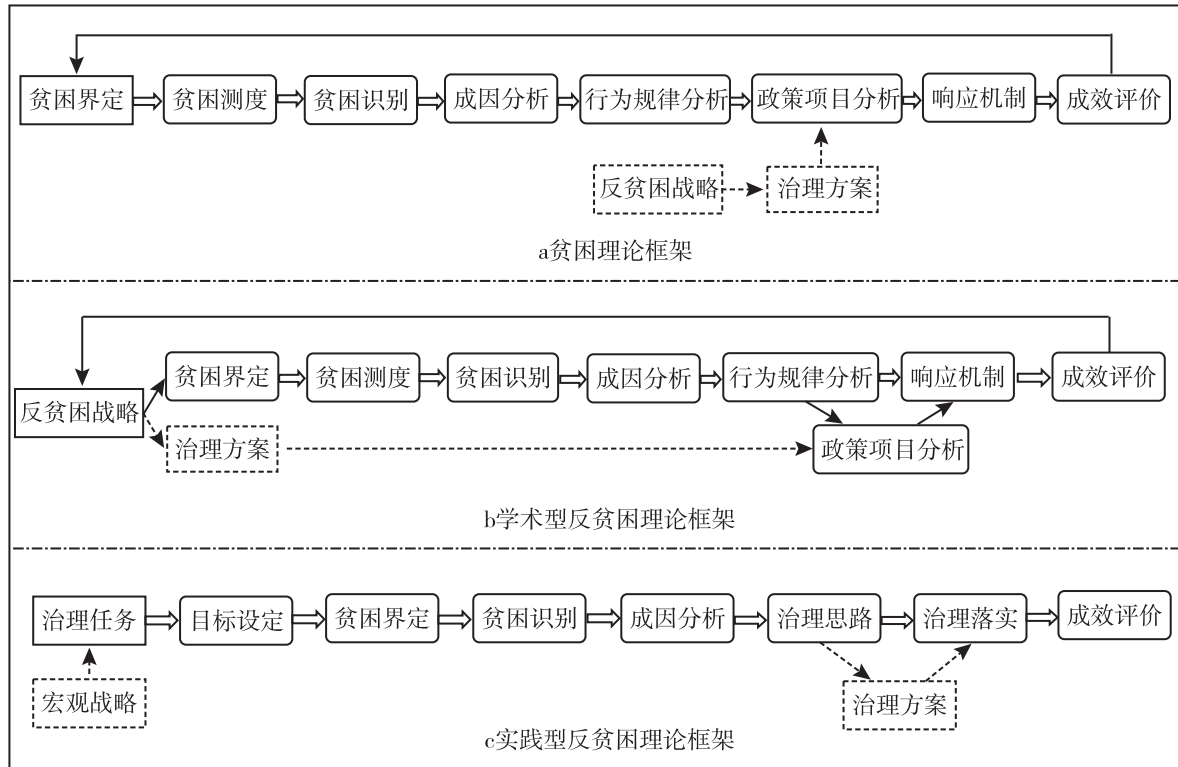


图1 比较视角的反贫困理论框架

注：①实线直角矩形文本框代表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实线圆角矩形文本框为理论框架的具体环节，虚线文本框代表外生因素。②实线及虚线非空心箭头代表外生影响，空心箭头代表理论路径。

图1前两种理论框架属于学术型理论，第三种属于实践型理论；图1第一种理论框架属于贫困理论，后两者属于反贫困理论。可见，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在逻辑上是连接贫困理论与实践型反贫困理论的中介。充分总结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有利于推动学术型反贫困理论的发展，并通过后者与主流的贫困理论对接。在贫困理论框架中，界定贫困概念后的一切分析都是实证性的，反贫困战略、政策项目都被当作给定的干预因素。这种做法只能发挥验证作用，无法提出系统、可落地的方案。反过来，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贫困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提出的，包含实践创新和潜在的理论创新，其价值是无法替代的。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可以通过检验、阐释实践型反贫困理论的成效而得以完善，进而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贫困治理提供参考。成功的实践型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并不是必然的，需要集战略家、理论家和实干家于一身的国家领导

者，以及能够汇集优秀学术及智库成果的有组织科研机制。因此，总结好已有的实践型反贫困理论意义重大。

三、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

按照本文构建的理论框架，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属于实践型反贫困理论，其主要内容来自对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的归纳提炼。本文引述的习近平反贫困论述集中于脱贫攻坚期，出自《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和《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同时参考部分其他资料。参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表述方式，本文将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两个明确、六个坚持”。

（一）明确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对消除贫困的重大意义有长期而深刻的切身感受。早在陕北当知青时，习近平同志就对农村贫困状况有深刻体会，立志通过辛苦劳作改变生活状况。在福建宁德工作期间，他深刻体悟一句古话：“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①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他对消除贫困的使命感进一步提升。邓小平同志曾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结合新时代新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使命。他指出：“如果贫困地区长期贫困，面貌长期得不到改变，群众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提高，那就没有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也不是社会主义。”^③明确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为脱贫攻坚战提供了深刻的理论依据。

（二）明确消除绝对贫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

进入新时代后，消除贫困作为一种定性要求如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衔接，就成为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但对如何测度和消除贫困的论述不够深入。习近平总书记在大量调研后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④。实现所有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脱贫是必须实现的底线任务。为此，就必须明确消除绝对贫困、全部脱贫等目标的具体内涵，如扶贫标准、扶贫对象和减贫数量等，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8-9页。

② 邓小平，199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73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3页。

指导。因此，“我们必须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向贫困发起总攻”^①。将消除绝对贫困确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成为推进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重要逻辑起点。

（三）坚持发挥制度优势，提高中国贫困治理效能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必须提高贫困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对贫困治理需求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均有深刻把握，充分论述了通过发挥制度优势来提高贫困治理效能的具体思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因此，加强贫困治理必须围绕党的领导展开。要坚持党管扶贫，建立从中央到基层统一连贯的党的领导体系，为脱贫攻坚提供坚强的政治和组织保证。要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进行系统性社会动员，汇聚强大的扶贫合力。

1. 加强中国共产党对扶贫工作的领导，把脱贫攻坚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确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而消除农村绝对贫困是其底线任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发挥中央的统筹作用，而且明确要求落实脱贫攻坚一把手负责制，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县一级是脱贫攻坚的前线指挥部，中央将减贫、民生、生态方面的指标作为考核贫困县党政负责同志的最重要的指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开发，要给钱给物，更要建个好支部。”^②要因地制宜加强贫困村的党组织建设，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对扶贫工作的领导力。

2. 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凝聚消除贫困的社会合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凝聚全党全社会力量，形成扶贫开发工作强大合力。”^③要完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和定点扶贫机制。要创新中国慈善事业制度，动员各类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广泛参与扶贫事业。在国家投入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十三五’期间宁肯少上一些大项目，也要确保扶贫投入明显增加。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央基建投资用于扶贫的资金等，增长幅度要体现加大脱贫攻坚力度的要求。中央财政一般性转移支付、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要进一步向贫困地区倾斜。省级财政、对口扶贫的东部地区也要按照这个原则，相应增加扶贫资金投入。”^④还要创新扶贫资金投入方式，创新金融扶贫模式，并加大扶贫资金整合使用力度。

（四）坚持走发展减贫道路，实现勤劳致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减少和消除贫困最终需要依靠经济发展，中国要坚持“用发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7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9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90页。

展的办法消除贫困根源”^①。这包含了“创造发展机会—提升发展能力—劳动增收—创造幸福生活”的可持续脱贫模式。

1. 将国家和区域经济稳定发展作为消除贫困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要将发展议程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更加突出的位置”^②。推动发展是促进全球减贫的必由之路。对中国来说，更具体的举措是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来增强西部地区的发展动力。东部地区不仅要“帮钱帮物”，还要推动产业层面的合作，帮助贫困地区发展经济。

2. 坚持走开发式扶贫道路。即使到了脱贫攻坚阶段，也要坚持把开发式扶贫作为基本的脱贫途径，坚持“造血式”帮扶机制。要持续提升扶贫对象的内生能力，使其有能力参与发展进程。要注意方式方法，在贫困地区发展产业项目要有带动贫困户脱贫的能力，为贫困户提供开发式帮扶措施要有针对性。

3. 为每个人创造通过努力获得成功的机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是党和政府工作的方向，但并不是说党和国家要大包大揽。要鼓励个人努力工作、勤劳致富，要创造和维护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通过努力都有成功机会。”^③

（五）坚持树立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实现内生脱贫

习近平总书记对扶贫开发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进行了辩证分析，提出贫困人口既是扶贫对象，又是脱贫主体。扶贫主体最终是为脱贫主体服务的。要坚持树立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使他们主动承担脱贫主体责任，通过努力奋斗走自主脱贫道路。

1. 贫困群众要摆脱思想和意识贫困，通过劳动自主脱贫。按照开发式扶贫模式，贫困群众凡是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在外部帮扶措施的支持下，通过自己努力工作实现勤劳致富。而实现勤劳致富的重要前提条件是贫困人口要形成“我要脱贫”以及“我能脱贫”的自我认知。贫穷并不可怕，怕的是有些人不想脱贫、不知如何脱贫。习近平总书记敏锐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因而强调“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④

2. 通过志智双扶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形成脱贫合力。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在扶贫工作中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性作用，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包括：要致力于提升贫困群众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综合素质，培养内在能力；要开展精神扶贫和文化扶贫，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防止“养懒汉”，避免简单发钱发物或者

① 习近平，2021：《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月26日02版。

② 《习近平：发展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总钥匙》，https://www.gov.cn/xinwen/2020-11/23/content_5563403.htm。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2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7页。

“一保了之”；要着重保障贫困家庭子女的受教育权利，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要改进帮扶方式，用好外力，激发内力，形成脱贫合力。

（六）坚持开展精准扶贫，确保精准脱贫

为在扶贫最后阶段有效消除绝对贫困，避免“大水漫灌”“大炮打蚊子”等无效扶贫，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精准扶贫方略，系统回答“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如何稳”等问题，对通过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起到了充分的指导作用。

1. 深入调查研究，精准识别扶贫对象。国家贫困标准是一个统计指标，没有具体落实到人头上，因此要形成“两不愁三保障”的可操作化识别标准和程序。“精准扶贫，关键的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摸清搞准，把家底盘清，这是前提。……搞准扶贫对象，一定要进村入户，深入调查研究。”^①建档立卡工作要进一步做实做细，提高统计数据质量，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2. 针对致贫原因，开展精准帮扶。要实施“五个一批”工程，针对农户的致贫原因和意愿、能力采取针对性帮扶措施。要把发展生产扶贫作为主攻方向，把易地搬迁扶贫作为重要补充，把生态补偿扶贫作为双赢之策，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治本之计，把社会保障兜底扶贫作为基本防线。要注重分类施策，该精准到户就要精准到户，该精准到群体就要精准到群体。扶贫政策要向民族地区倾斜，对深度贫困地区要有更特殊的扶持措施。实现精准帮扶，关键要建立一支有领导力、有执行力的帮扶队伍。要让县级党委成为全县脱贫攻坚的总指挥部，为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和扶贫工作队，为贫困户确定帮扶责任人。

3. 采取多种措施，确保精准脱贫。与过去贫困人口只是在统计意义上脱贫不同，精准脱贫要对每个扶贫对象的脱贫情况进行评价，关键是建立反映客观实际的贫困退出机制。习近平总书记从四个方面提出了系统性要求：“一是要设定时间表，实现有序退出”；“二是要留出缓冲期，在一定时间内实行摘帽不摘政策”；“三是要实行严格评估，按照摘帽标准验收”；“四是要实行逐户销号，做到脱贫到人”^②。要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在考核中运用第三方评估和社会监督，敢于较真碰硬，督促引导各地区做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七）坚持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脱贫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扶贫攻坚改为脱贫攻坚，表明到2020年一定要兑现承诺的决心。“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全党全国要勠力同心，着力补齐这块短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59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71-72页。

板，确保农村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①

1. 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7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标志性指标。只有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才能有足够的力度补齐这块短板。脱贫攻坚工程是任务、路径、措施、资源和方法的综合集成，需要更大的决心、更精准的思路和更有力的措施。

2. 突破消除绝对贫困的阻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前脱贫攻坚既面临一些多年未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挑战。脱贫攻坚已经到了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所面对的都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②。这就要求：一方面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要下更大的决心，采取超常规举措，如期兑现承诺；另一方面要做好应对和战胜各种困难的准备。

3. 攻克深度贫困堡垒。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调研提出深度贫困问题，指出要树立战胜深度贫困的信心，要“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以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帮扶措施为抓手，以补短板为突破口，强化支撑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倾斜力度，集中力量攻关，万众一心克难，确保深度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③

（八）坚持开展国际合作，推进全球减贫

消除贫困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类的共同使命和共同理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国际减贫交流合作不仅是中华文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助人为乐优良传统的体现，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大局的一部分，是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大账”，必须正确看待。

1. 做全球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减贫事业是世界减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减贫道路和经验可与世界分享。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在帮助中国消除贫困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也积极支持国际组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积极贡献。中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展了良好合作，中国减贫是国际合作的典范。因而，习近平总书记反复表达对国际减贫事业的坚定承诺，并通过提出行动倡议、设立援助项目等方式推动国际合作。

2. 在国际减贫援助合作中积极作为。一方面，中国“始终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力所能及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④。中国重视发挥中国国际扶贫中心等平台的作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交流分享减贫经验。另一方面，中国愿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7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22页。

④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2页。

意为发展中国家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中国逐步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体现出中国在国际减贫援助合作中的积极作为。

3. 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为了实现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各国要开展平等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中国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将同各方一道优化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进南北合作，加强南南合作，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充足资源和强劲动力”^①。

四、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科学性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0）提出，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判断一种理论是否科学，主要是看这种理论是否包含鲜明的主题，是否系统回答了所处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和完整的结构，以及是否不断开放发展。以此作为评价依据，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经过脱贫攻坚实践检验而不断丰富完善，提出了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的理论主题，完整回答了新时代贫困治理的基本问题，具有完整的理论结构以及开放发展的特征，从而符合科学理论的基本要求。不仅如此，习近平反贫困理论还形成了与传统理论截然不同的扶贫资源配置范式，使消除贫困目标的实现具备坚实的学理基础。

（一）明确提出了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这一鲜明的主题

习近平反贫困理论集中形成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特定时期，其鲜明的理论主题是新时代消除绝对贫困。在党的十八大之前，消除贫困尽管一直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但其具体内涵并不明确。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一个标志性指标。”^②因此，中国必须在2020年完成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任务。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在可计量意义上提出消除绝对贫困的目标，并为之制定相应的脱贫方案。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既是对中国在减贫最后阶段为何要加大力度反贫困等中国特色反贫困问题的回答，也包含对如何跨越减贫“最后一公里”障碍、如何打破贫困代际传递等一般性反贫困问题的理论回答。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54-15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页。

（二）完整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反贫困的基本问题

本文提炼的“两个明确、六个坚持”完整地回答了新时代中国反贫困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包括新时代如何认识贫困、消除贫困任务的紧迫性、如何反贫困、如何如期脱贫、如何防止返贫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①“也不能到了时候我们一边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边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扶贫标准线以下。”^②因而，新时代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短板。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从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走发展减贫道路、尊重贫困群众的主体地位和走内生脱贫道路、以精准扶贫方略和脱贫攻坚战解决减贫“最后一公里”问题等方面，系统回答了如期脱贫、精准脱贫的问题。不仅如此，精准脱贫还意味着脱贫后要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从制度上消除贫困根源。

（三）具备完整的理论结构

从以上对中国反贫困基本问题的回答可以看出，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具备从提出问题、设定目标到形成解决方案、效果监督和评估的完整闭环结构。这一闭环结构可以分解为两个部分，并嵌入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一方面，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中的目标设定、治理方案落实和成效评价部分可被视为学术型反贫困理论框架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中作为逻辑起点的治理任务确立（将消除贫困作为国家使命）构成了构建新时代反贫困战略的思想动力及制度保障。以此为前提，学术部门可参照该战略下的贫困定义、标准以及脱贫攻坚战方案，开展从贫困测度到成效评价的全环节学术分析，从而实现实践型反贫困理论和学术型反贫困理论的有机结合。

（四）实现反贫困资源配置范式的创新

相较于传统的减贫理论，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实现了资源配置由单一的经济效率原则向需要原则的转变，这是从以资源为中心转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反贫困资源配置范式的创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布局中，习近平总书记设定了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宏观目标，并将其具体化到个人，划定了反贫困任务的边界，系统性改变了反贫困理论及实践的逻辑框架。为了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要开展精准识别和建档立卡工作，分析区域性以及个体性致贫原因，并提供针对性帮扶措施。常规反贫困理论强调资源稀缺以及给定扶贫资源下的减贫效果最大化。这本身并无不妥，但如果资源有限，实际减贫工作必然难以达成既定减贫目标。习近平总书记认识到减贫效率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2018：《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2页。

边际递减的规律，因而同步考虑扶贫资源配置效率和数量保障问题：一是要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扶贫资源投向扶贫对象，争取产生最好的效果，即通过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二是要创新方式办法，筹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需的巨量扶贫资源，并动员各方面的扶贫力量。精准扶贫方略和脱贫攻坚战略部署正是解决这两个方面问题的有效工具，两者的关系是内在一体的，能够产生系统性、整体性脱贫效果。

（五）具有开放发展的内在理论品质

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形成体现了鲜明的开放发展特征。第一，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形成过程具有发展性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反贫困问题的思考前期侧重地方性、群体性贫困问题解决，后期侧重全国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整体脱贫。习近平反贫困论述经历了理论化和一般化的发展过程，从前期侧重解决扶贫中的思想观念、方式方法等具体问题提高到后期社会主义本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政治高度。第二，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形成机制显示了开放性特征。在河北省正定县、福建省、浙江省等地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一直是党和国家反贫困政策的坚定贯彻落实者，同时也通过主动性实践和思考丰富与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例如，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提出“弱鸟先飞”^①等发展理念，推动相对落后的闽东地区实现追赶式发展。习近平同志在推进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时提出的“联席推进、结对帮扶、产业带动、互学互助、社会参与”对口扶贫协作机制，成为三十年来闽宁协作规范化运行的坚实基础（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2026）。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逐步形成，并成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主体性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在消除贫困与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推动共同富裕之间建立起以发展为主线的理论联系。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承认绝对贫困之外还存在相对贫困、脱贫不稳定以及返贫风险等问题，因而与国际减贫理论存在天然联系。

五、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创新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用“七个坚持”概括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因此，有必要对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和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联系和区别进行客观辨析。本文的主要结论是：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是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组成部分；分阶段来说，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主要形成于党的十八大以后，是对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继承和创新，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主体性内容。

^① 习近平，1992：《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页。

（一）对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有两大特点：一是其涵盖的时间周期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主要是脱贫攻坚时期；二是“七个坚持”有一系列默认的理论基础，如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为了更好地从比较视角考察习近平反贫困理论，需要从更长的历史视野中考察和总结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分别提出了关于反贫困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共同构成广义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①，是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重大成果（杨雪英，2009；杨灿明，2021；任东景，2021；王禹澔，2022）。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持续深化改革，消除贫困的制度性根源；二是坚持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反贫困事业，发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政治优势；三是遵循从消除贫困、共享发展到共同富裕的发展主线；四是坚持将反贫困纳入国家治理总体格局，不断提高反贫困行动的战略地位；五是坚持将发展生产力作为最主要的减贫方式，强化增长包容性和益贫性；六是坚持将开发式扶贫作为主体性农村扶贫手段；七是建立普惠政策与特惠政策相结合、有利于减贫的社会保障体系；八是构建全社会协作的中国特色大扶贫格局，凝聚社会合力；九是在减贫最后阶段开展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战，解决扶贫措施与贫困人口需求脱节、扶贫力度与脱贫需要脱节问题；十是坚持内生脱贫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

从理论内涵与外延看，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和习近平反贫困理论都是相对自成一体的理论，前者以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摆脱贫困和走向共同富裕为研究对象，后者以中国在新时代如何消除绝对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研究对象。可见，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是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形成和实践过程中孕育和形成的，两者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联系。从生成逻辑以及理论构成来说，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有三重关系。

1. 在理论探索中推动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形成和完善。习近平同志在到中央工作之前就长期推动扶贫工作，并同步进行理论探索，发表了《知之深 爱之切》《摆脱贫困》《之江新语》等著作。他较早提出了“扶贫先要扶志，要从思想上淡化‘贫困意识’”^②，要有滴水穿石的精神品质等精辟论断。习近平同志提倡“经济大合唱”，鼓励干部“四下基层”^③；在推动闽宁扶贫协作时，探索建立了市县结对帮扶、互派

① 如无特别说明，以下论述均采取广义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定义，但省略广义二字。

② 习近平，1992：《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7-8页。

③ 习近平，1992：《摆脱贫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第10页、第43页。

挂职干部、部门对口协作、产业协作共赢等闽宁扶贫协作落实机制；在扶贫搬迁方面，推动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畲族造福搬迁工程和宁夏闽宁村建设，为形成系统的扶贫搬迁思想打下良好基础。在福建省和浙江省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大力推动山海协作，一体化落实东西部扶贫协作和省域内发展协作。习近平同志的地方扶贫工作实践有力落实了中央扶贫开发政策，而其对反贫困的思考使一般性、原则性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变得具体化和条理化。

2.在理论发展中继承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成果。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系统总结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全过程，并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实践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建立在此前已形成并经实践检验的党的十八大以前的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基础之上，并在脱贫攻坚实践中不断升华。这一前期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结晶，是中国反贫困经验的系统总结，也包括习近平同志本人的贡献。

3.在新时代成为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的主体性内容。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如何消除农村贫困的新思想、新思路在密集的农村调研、座谈会和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大量涌现。其核心思想包括：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要实行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要提高脱贫质量、“扶上马送一程”、坚决防止返贫致贫等。因此，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是为了解决新时代农村贫困问题而提出的，并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得到了实践检验。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完善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其自身也成为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对全球减贫理论的贡献

在贫困问题研究中，反贫困理论发展不成熟，甚至受到贫困理论研究的排斥。因此，经过实践检验的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不仅需要与国际理论进行对话，而且承担推动反贫困理论发展的重任。针对国际上已有的减贫理论，习近平反贫困理论至少在以下六个方面实现了突破，并形成独创性贡献。

1.将反贫困战略的定位提升到国家使命和国家治理高度。习近平总书记主张，消除贫困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不能先发展经济后反贫困，或者让反贫困让位于经济发展。反贫困是重要的国家使命，要与经济发展同步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出发，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使其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应将反贫困纳入国家治理议程。

2.推动全面脱贫目标定量化和可操作化。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理念之后，扶贫部门和统计部门开展合作，基于建档立卡经验以及贫困监测数据分析，将贫困监测标准转化为贫困识别及扶贫标准。入户调查与社区评议相结合的贫困识别方法

成功突破了贫困标准转化的障碍，为实施精准扶贫、制定可分解到村到户的扶贫任务、建立贫困退出机制提供坚实的基础。

3. 将单一的扶贫瞄准升级为全方位精准扶贫方略。基于中国已有的丰富扶贫经验，习近平总书记从扶贫措施“供给”和贫困户脱贫“需求”两个层面出发，提出了“六个精准”“五个一批”的精准扶贫思路以及系统性脱贫措施；针对供需脱节问题，提出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结合起来，解决内生动力不足问题，指导形成跨越“最后一公里”障碍的有效方案。

4. 塑造由国家承担消除绝对贫困责任的大扶贫格局。在很多贫困理论中，减贫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家的作用主要是提供扶贫资源和设计扶贫项目，政府与相关机构、社会组织的职责与定位不明确。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主张由国家主导扶贫，明确由国家履行消除绝对贫困的责任，在中国就是要坚持党管扶贫和政府主导，这在各类反贫困理论中是绝无仅有的。当然，国家承担责任也包含充分动员全社会力量，汇聚足够强大的反贫困力量。

5. 将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从按经济效率配置调整为按需要配置。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以限期消除现行标准下的农村绝对贫困为目标，倒逼各级政府按照脱贫需要配置扶贫资源。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常规扶贫追求有限投入下的产出最大化，脱贫攻坚则追求预定产出下的投入最小化。由于人均投入强度随脱贫难度加大而提高，追求最小化的结果是超大的投入规模。这种看似背离投入产出原则的资源配置方式恰恰是对减贫规律的尊重，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鲜活体现（蔡昉，2018）。

6. 重塑减贫与经济增长、生态保护的关系范式。经济增长的涓滴减贫效应递减规律在中国同样存在。这在脱贫攻坚与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叠加阶段尤其明显。为此，中国一方面重视稳增长和保就业，要求东部地区在扶贫协作、就业方面支持西部地区发展；另一方面在贫困地区以脱贫攻坚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提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民生方面指标的考核权重，重点考核农村居民收入、减贫、生态保护等社会和生态效益指标。中国在西部地区加大易地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生态扶贫措施的实施力度，改善了生态环境，促进了绿色发展，实现了多赢，超越了增长与保护难以兼顾的传统发展路径。

六、提炼形成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重大意义

提炼形成习近平反贫困理论，有利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建设，促进中国学术型反贫困理论研究，为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战略转型提供理论指导。

（一）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体系建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博大精深，从学理阐释的视角，可将这一科学体系划分为统领性核心内容与各领域重大思想成果。这种理论结构在现有学术归类研究中存在一定局限：部分具备理论特质的重要论述难以进行单一维度归类，无法完整展现其丰富理论内涵。例如，习近平反贫困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内涵远超经济范畴，但不少研究简单将其归入习近平经济思想，导致其理论价值难以充分体现。将这类重要论述归纳提炼为理论，有助于更加完整地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从学理层面看，这些理论成果，有的可以归入现有各领域重大思想成果，有的不宜简单归入某一领域重大思想成果，如习近平反贫困理论，可以保持相对独立。

（二）促进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发展

反贫困理论有学术型和实践型之分，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不过现实情况是，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发展严重滞后于贫困理论以及实践型反贫困理论发展。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打破理论发展瓶颈提供了契机。相较于贫困理论侧重解释致贫原因、政策项目减贫效果、减贫为何无效等“为什么”问题，反贫困理论更关注哪些战略和政策更有效、减贫障碍如何克服、减贫战略如何推进等“怎么办”问题。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经过实践充分检验，蕴含精准扶贫、内生脱贫等大量原创性观点，回答了国际减贫理论中的识别偏差、减贫战略有效性、跨越“最后一公里”障碍等关键问题，填补了反贫困理论的诸多空白，有助于推动兼具理论严谨性与实践指导性的学术型反贫困理论实现突破性发展。

（三）指导新时期中国反贫困战略转型

消除绝对贫困以后，中国面临新的实践任务，如健全常态化帮扶机制、推进农村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帮扶等。目前，中国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仍然面临不少问题，迫切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指导。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如何适度提高防止返贫致贫监测标准、如何有效衔接防止返贫致贫机制与社会救助制度、如何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分层分类帮扶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撑。此外，全球减贫形势依然严峻，中国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承诺需要得到更有效的推进。这需要强化习近平反贫困理论的国际传播交流，更好地发挥其在国际合作以及改善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中的作用。

参考文献

班纳吉、迪弗洛，2018：《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景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第11-19页。

蔡昉，2018：《穷人的经济学——中国扶贫理念、实践及其全球贡献》，《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0期，第

4-20 页。

邓金钱, 2021:《习近平扶贫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价值意蕴》,《财经问题研究》第1期,第14-22页。

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 2026:《探索出跨越山海的东西部协作共赢之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感悟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推动闽宁协作的前瞻思考和探索实践》,《人民日报》7月06日09版。

龚云、刘鑫鑫, 2021:《习近平反贫困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第13-19页。

黄承伟, 2018:《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扶贫思想》,《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第12-18页。

刘永富, 2018:《习近平扶贫思想的形成过程、科学内涵及历史贡献》,《行政管理改革》第9期,第4-7页。

全国政协办公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专题研究”第一课题组, 2026:《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脱贫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人民政协报》4月07日03版。

任东景, 2021:《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中国化的进程及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第81-88页。

森, 2013:《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贇、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85-110页。

檀学文、李静, 2017:《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的实践深化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第9期,第2-16页。

王飞, 2022:《论习近平扶贫思想的科学性》,《经济研究导刊》第11期,第1-3页。

王小琼、陈根来, 2021:《习近平扶贫论述的理论特质分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第1期,第21-27页。

王禹瀚, 2022:《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对西方减贫理论的超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第2期,第109-118页。

辛向阳, 201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态的四大特征》,《科学社会主义》第1期,第48-53页。

杨灿明, 2021:《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管理世界》第11期,第1-15页。

杨雪英, 2009:《新中国60年四代党中央领导人的反贫困理论与实践》,《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第13-16页。

张建君, 2021:《习近平反贫困重要论述的理论内涵与精神实质》,《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第17-23页。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202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问题》,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第14-17页。

Bradshaw, T. K., 2006, "Theories of Poverty and Anti-Poverty Programs i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38(1): 7-25.

Brady, D., 2019, "Theories of the Causes of Pover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45: 155-175.

Pineda, M. E., 2025, "Theories of Poverty", <https://www.profolus.com/topics/theories-of-poverty/>.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and Its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TAN Xuewe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ummary: Extensive research has been carried out to interpret Xi Jinping's exposi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yielding abundant theoretical insights. Nevertheless, existing studies still have deficiencies in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aims to fill the gaps in previous research, raise the level of systematic and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Xi Jinping's exposi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strengthen its capacity for theoretical dialogue. To achieve this go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distill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from Xi Jinping's exposi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defines it as a practice-oriented anti-poverty theory, demonstrates its scientific nature, and distinguishes its logical connections with academic-oriented anti-poverty theories.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verty theori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anti-poverty theorie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anti-poverty theoretical framework from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t find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actice-oriented anti-poverty theories helps advance academic-oriented anti-poverty theories, which in turn serve as an intermediary linking the former with mainstream poverty theories. Referring to the formula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ore content of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as "Two Clarifications and Six Adherences". At its heart, the theory addresses why and how China eradicated rural absolute poverty in a timely manner in the New Era. Featuring a distinct theoretical theme,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systematically answers fundamental questions concerning anti-poverty work in the New Era. It boasts a complete logical structure, realizes innovation in the paradigm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embodies openness and continuous development, thus meeting the basic requirements for a scientific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heoretical relations,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inherits, innovates and develops the Anti-Povert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eanwhile, it facilitates breakthroughs and potential transformations in global anti-poverty theories. Thanks to its scientificity and theoretical value,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carries multiple positive implication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dvancing academic-oriented anti-poverty theories, and gui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nti-poverty strategy in the next stage.

Keywords: Xi Jinping's Exposi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Xi Jinping's Anti-Poverty Theory;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Fight Against Poverty

JEL Classification: I32; O15; P26

(责任编辑:鲍曙光)